

內容分析與歷史的客觀性解釋及判斷

閻沁恆

——並以胡適留學日記內容作一實際的分析——

壹、前言

史學家的記述、解釋和判斷希望能達到真實、允妥和正確，但是即使是最親近的人，我們對他的瞭解仍然是微乎其微，更何況要用文字把人和事形之書冊而不失其真！史學家著述之際，特別是撰寫傳記時，述及傳主的事功，也述及他的人格和個性，不過直接的觀察，間接的蒐集以及史料的記載都無法保證史料的完整性與客觀性，多少史家選用了含有偏見的資料而未曾察覺，多少史家無意間注入自己的主觀而尚不知曉，所以尋求一種方法，而能用以改進這些缺陷的努力，實在是必須的。

史家的著述不僅述及人與事的表面，而且極望能深入內裏，像精神病理家一樣，根據診療的現象，作科學的正確分析。而這種分析有時不易從文字表面的意義獲得，必須找出一些特徵，藉研究的技術以作判斷。傳統的文學方法固然做到相當嚴謹的地步，但缺乏簡明而系統的步驟，實有必要吸收新的技術而加以改進。

內容分析方法目前已廣泛的受到人文及社會科學家的重視，而且無論就原則和個案方面均已有了相當數量的成果，若干研究史學的學者亦有論著討論內容分析在史學研究的領域中如何應用的問題。作者鑑

於此種趨勢甚有助於史學方法的更新，於是擬探討內容分析與歷史客觀解釋及判斷的問題，並且已涉及方法的如何應用，所受的限制及可能產生的效果等方面。

本研究計劃擬討論以下五個問題：

- (一) 內容分析可延伸歷史研究的時間；
- (二) 內容分析可擴大歷史研究的領域；
- (三) 內容分析可增加歷史研究的客觀性；
- (四) 內容分析可加強歷史研究的深度；
- (五) 內容分析可使歷史研究更富於科學的精神。

由於內容分析有較精密而系統的選樣方法，所以在時間與空間方面可擺脫過去的一些束縛，在有限的人力與物力下，仍能作時空領域較大的研究，而不致顯的粗簡不精。研究二次大戰期間的中英關係，以敘述性的方法處理，便覺得有關資料浩如煙海，無從着手；然而以蔣委員長有關言論與邱吉爾首相的有關言論作內容分析的研究，或者是以中央日報與泰晤士報的記載作選樣的內容分析，則不但方法可行，而且結果也比較可靠正確。歷史研究自始就重視客觀與深度，但亦僅可作到人力可及的地步為止。文化的模式與個人的先入之見常使兩種記述同一史事的書籍給人以難以一致的印象，因此一書既出，必引發許多激烈的爭論，你一證據，他一證據，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很難定於一衷，都只因爲主觀之見爲多，而缺乏客觀的標尺。史著的撰寫當然保持着相當的深度，但是像秦始皇、漢武帝、亨利第八、希特勒等，我們多麼需要更深入更超然的記述和分析，從背景、從心理、從人格諸方面對於特殊性格與特

殊行爲作適當的陳述！歷史學的方法論在求是求真的要求下，無人可否認其合乎科學的精神，但方法的應用，貴乎心靈的巧運，在細節和研究工作步驟方面總欠缺劃一的標準。我們否認史學方法沒有科學精神，但我更有責任將史學方法改進到更爲科學。引用內容分析的方法，講求研究的設計及研究步驟的系統化，以歸類統計作分析的憑藉，就是把史學科學化的有效途徑之一。

貳、資料的鑑別與選擇

一、一般史料

美國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曾這樣寫道：

當我特別以及真正的對於某人發生興趣的時候，最大的難題是去說出何者最近我的心靈。這真是一件不幸的安排！我希望能及時的克服它，至少在寫作時能暢所欲言。具有強烈的感受並非愉快和有益的……我有一種隨身帶着一口火山般的不安感覺。我的得救寄於被愛戴之中。信任任何關於自己的事情幾乎對我是絕對的不可能——尤其是我的智能的任何隱秘——對任何人的同情我絕不能在事前予以肯定（註一）。

威爾遜承認認識自己、信任自己和表達自己是非常困難的、那麼歷史家要記述和表達他人豈非更加困難！所以寫史非易，我們不能以天才自居而深信有克服這重障礙的本領。

史家特重史料的鑑別，辨析真偽，區分可信等級，以作一般新進學者實際研究時的選擇的依據。以

時間劃分，史料通常分當時人的記載和後人的追記；以記述的方法分可分親身的記載，同時代人的記載與後人的記載，亦分第一手資料與第二手資料，目的即在細密的鑑別史料，勿以可信度較差的史料為選擇對象而忽略了可信度較高的部份。

達到資料的完整，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認真的史學家從來不誇口自己的資料已完全或接近圓滿。他決定題目之後，首先就是要廣泛的蒐集資料，不管數量多到堆集如山或少的如鳳毛麟角，都得盡力而為。資料齊全以後，即開始閱讀工作，同時也作去蕪存精的工夫，留着緊要的部份作援引、分析與評斷的根本，最終則開始歸類、分析和提出主張和推論。一般史料的鑑別可從外在的和內在的兩個方面入手（註二）

內容分析依賴對一般史料的分析並非特別重要。因為其中許多部份屬於有意的史料，在中國像是官修的史書，雖然也有它的優點，但立意歪曲和貶降誇張之處絕非無有，所以沒有審慎鑑別之前，不宜輕率採取。然而許多無意的史料則是在自由發抒、真情流露的情況下據實著筆，以之作爲內容分析的素材，所得結果才比較可信。

二、文獻

採用各種歷史文獻作內容分析，可以發現史料本身所代表的時代意義、彼此間的異同比較、以及政治、社會、心理、經濟等縱的發展趨向，幫助解釋史事的因果關係，並且找得成功失敗的關鍵所在。

美國哈佛大學的三位教授斯密士（Marshall S. Smith）、史東和葛林（Evelyn N. Glenn）於一九

六五年二月完成一篇研究報告，題為「二十篇總統提名接受詞的內容分析」（註三），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六四年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歷屆獲選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在全國代表大會中接受提名的演說詞加以分析，除了採用傳統的分析技術外，特別注重社會學及心理學方面的比重，並藉電腦作統計分析的工作。就方法論的觀點可分三部份敘述：

（一）使用三階段的研究方法以研討演說詞的內容，並且陳述研究的結果。第一階段是對圖表式的結果加以分析，集中在一九六四年候選人間的差異方面。第二階段為以摘要的步驟尋得類目時間頻數的差異及兩黨間的不同。第三階段為對類目組成項目以及演詞得分的分析。此一方法對分析程序的比較甚有助益。

（二）首次採用兩種不同的類目作一種分析。因而兩組分析的結果彼此均互相關連。譬如權力（Power）的類目與權威主題類目（authority—theme category）彼此在時間方面產生負的關連。權力常在民主黨的候選人演說中出現；權威主題則在共和黨候選人演說中常常出現。共和黨的演說以較多頻數強調傳統的與既定的權威觀念，而民主黨則在演說中以較高的頻數提到行使控制實際途徑。

（三）介紹以心理學與社會學為基礎而分析歷史的文獻之方法價值，與以往政治內容分析的基礎同為一轍，但未照過去政治學的類目那樣去做。

由於上述方法的應用，可以從不同時間的角度，分析出兩黨總統候選人演說內容的差異，這種內容的特性可區分三個範圍：候選人提出的論題，應付這些論題所欲循之途徑，對某一候選人的特性和人格

的反映。

就時間的演進而論，用以指出國內經濟問題的單字與片語逐漸有遞減之勢，後期的演詞中，對國內外政策問題亦趨向於包容較廣的普及傳播。這種減少對經濟方面的重視與指出傳統行為模式、道德的權威與強調力量與權威的文字之減少是平行發展的。此點提示出三十及四十年代的社會結構是若有人欲行施權威或控制他人，可依賴某種權威關係、義務與職責以及習慣形成的行為標準。

於近期的演說中，比較少用直接控制與說服的方式，相對的、意指需要、慾望、有目標的行為以及間接影響的企圖則顯著的與時遞增。近年候選人以訴之於選民的需要和慾望而希望獲勝，指出具體的手段以達成預期的目標，不用訴之權威關係以影響選民的行為與決定。

這種趨勢在兩黨候選人的演詞中均為一致，但共和黨人在放棄國內經濟問題以及傳統的權威結構以解決問題方面，通常比民主黨要緩慢。當共和黨人以較高的頻數提到既定的權威與道德規範時，民主黨却強調實際控制他人行為的途徑，同時共和黨的演詞顯示用較高頻數的文字以指示正常的社會結構、個人的潛力與自由以及在中央集權下的自由。

就一般情形而論，某些候選人政治情況與人格特性的複合顯然產生交換影響的重要的偏差。如一九四八年，杜魯門和杜威都超出他們的先進演詞之範疇。杜魯門在一次艱辛的選舉戰爭，強調許多具體議題並且攻擊當時的國會；杜威則顯然是要使自己超越具體的論題而發表概括性的道德性演詞。相似的情形，一九五二年艾森豪由於他享譽正隆，演說多帶說教的口氣，僅涉及少數的具體問題。斯蒂文生在這一年，以知識階級的方式檢討現代社會的複雜性，並以反省的語氣談論的當選總統的條件。其中每篇演

詞都反映每一黨及每一時代論題與方法之異同（註四）

最後的一項對比是一九六四年兩位候選人的演詞。詹森的演詞，除了加強一般的趨勢外，傾向於說服以及需要和希望的訴求，一個不斷重複的修辭設置是，「大多數美國人需要……我也如此。」這篇演說被列為具有頗高的領導性質就像其中的一些字眼「一致的」、「每人」、「統一」、和「一般」等皆充分表達了上述的特性。由此顯示出一幅景象，那就是一位堅強自信的領袖訴之於廣大的選民，這種訴求本質上即有廣佈與普及的性質。

高華德的演詞，相反的是高度而典型的訴之於直接的權威與權力的論題以及道德的成分。他所談論的論題，並非對經濟方面傳統性的關懷，而是當時政府的挫敗與弱點。因此高華德的演詞反映出對傳統權威結構力量的一種信念以及假道德之力解決當代社會的問題（註五）

史東等人的這篇研究報告動機為着眼於政治方面的好奇，但是從字句的統計，所使用的策略及慣用語彙以及語氣中所表現的人格特性與時代背景的特點，均是史學家寫史之際亟欲參考或援引的寶貴資料。史學中的許多解釋與判斷非常需要社會學與心理學方法求得的結果、內容分析在這方面的貢獻，恰巧可有助益，因而值得借重。

三、報刊

一九二〇年代內容分析尚在草創的階段，一些先驅學者們就是以報紙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如郝瑟（Earnest O. Hauser）的「美國日報上的遠東新聞」（註六）就是一例。到一九四〇年代則有海因德（

Richard H. Heindel)的「英國報紙中的美國」(註七)及克利斯保(Martin Kriesberg)的「紐約時報中的蘇俄新聞」(註八)。他們使用的方法由簡單的主題分類漸漸進入較複雜而深入的新技術。如果史家著文要論及當時的美國與遠東的關係、論及英美和美蘇的關係，這些成果遠比自報紙上直接得來的資料更可靠和更具體，而且若再進一步涉及輿論，則幾乎成爲必用的有力參考圖書。

一九六四年，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何恩第(Ole R. Holsti)完成「對外的衝突與對內的一致：匪俄個案」(註九)，向美國心理學協會宣讀的一篇論文，以後又補加上一九六五年的部份，成爲現在的論文。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五年選定了典型的七個時期：

- (一)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韓戰爆發。
- (二)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赫魯雪夫訪問美國。
- (三)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到二十五日：美國支持下的對古巴入侵。
- (四)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古巴危機最緊張的時期。
- (五)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解決古巴飛彈危機的商談時期。
- (六)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五日：英美蘇簽訂禁試條約。
- (七)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美國決定轟炸北越。

作者採用了共匪及蘇俄領導決策人員的八十二項文件利用電腦作一分析。他的假設是：「匪俄對美國的態度當東西集團高度衝突時趨於相似，當緊張漸降時，對美國的態度趨於分歧。」(註十)

測量態度的頻數與強度分成三部門：①正面的影響及反面的影響；②強力與弱點，③主動與被動。

運用圖表的形式製成「蘇俄與共匪對美國政策的認識——衡量（頻數×強度）總數表」、「東西方緊張局勢升高或降低時期蘇俄與共匪對美國政策認識的差異表」及「共匪與蘇俄對一九六三年七、八禁試條約的認識表」（註十一），將匪俄間對美國政策的認識差異與相似之點，清楚而準確的表現出來，這也是一般敘述性方法所難以獲致的。

研究的結果顯示，當韓國、古巴、越南危機達到高峯時，共匪與蘇俄對美國政策的認識為壓倒性趨向鑑別、能量及主動部份的否定、堅強、主動方面。當三個東西緊張局勢降入低潮時，則匪俄間的認識差異較前述三個高峯時期為大。

上述研究的結果，雖然假設的驗證提供了有力的憑據，但是並非可貿然斷定，匪俄對美國政策的認識只有東西雙方局勢的緊張與鬆弛為唯一決定有無歧異的因素，人格、思想及內部政治狀況的重要性依然存在。

另外一篇以報刊內容為分析的對象，而所得結果對於史事的解釋與判斷裨益甚多的研究論文是耶魯大學政治學助教授莫利特（Richard L. Merritt）於一九六三年發表於民意學季刊題為「殖民地時代的美國民意——分析殖民時代報刊的內容」（註十二）。

此篇報告包括的時間是一七三五年到一七七五年共四十一年。實際上一七〇四年甘拜爾（John Campbell）在波士頓（Boston）城發行由手寫改為印刷的波士頓新聞信，可算是有印刷物的開始，但許多刊物中途夭折，也有部份已殘缺不全，所以只得就此一時期連續發行的刊物，從五個城市中各取一種

研究涉及的地區是殖民時代北美洲最大人口集中的五個中心——波士頓、紐約城、費城、威廉斯堡以及南加羅林諾州的查爾斯頓城。這五大城市或可代表相關的區域甚至十三州的殖民地。但是也有不可避免的偏差，在殖民後期年代中，這些大城中都有重要的保王黨與反政府派。唯可調和此項缺點的事項是非城市區域當時均沒有報紙，依賴城市報紙作其新聞中心。其他有報紙的城市還有若干，但做爲一項小型的研究，這樣選擇亦可差強人意。

選定報紙根據三個標準：①於一七三五年至一七七五年期間連續的發行；②目前可以找到而且尚屬完整；③報紙的聲譽。以政治的觀點而言，應該是包括輝格黨（Whig）——急進黨與托利黨（Tory）——保王黨。屬於前者的是波士頓公報（The Boston Gazette）與國家新聞（The Country Journal）；屬於後者的報紙爲麻州公報（The Massachusetts Gazette）與波士頓新聞信（The Boston News-Letter）。

選樣的大小足以求證假設爲大。研究的時間長久，而且像報刊這類資料如一份一份的仔細研究而不用選樣的便利，則結果必費時費錢，得不償失。本報告所用報紙實際上只是一種新聞週刊，當時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尚無日報，所謂報紙即爲週刊。於一年中以隨機選樣的方法取四份報紙，分析的結果，確能爲殖民地時代許多重要的民意問題找出答案。

以上的兩個問題的研究，說明分析報刊過去的內容，可爲歷史事件找出新的解釋與答案。是新聞學者、歷史學者。政治學者及國際關係專家所共同關心而發生興趣的研究領域。史學家向來重視報紙得來的資料，一張報紙，就是當日社會各項動態的真實紀錄，用以反映當時政治趨向、社會狀況、經濟生活

等詳盡逼真，實爲當今及以後史家的上好資料。但今後報刊資料浩繁，小規模的傳統方法已漸難適用。內容分析可自難以計數的報紙中，以一定的系統方法僅擇少數代表性的個樣，經歸類統計之後，即可得出與研究全部資料差距甚小的結果，這一優點深值各有關學科的專家重視與採用。

四、傳記雜記隨筆

傳記、信札、雜記、隨筆都是內容分析比較理想的資料，便於從研究中得到一些具體而有意義的事例，藉以作適當的推論，而產生新的成果。懷德（Ralph K. White）曾對黑人男童一書作過內容的分析（註十三），奧波特（G. W. Allport）亦研究過珍尼的書信一書（註十四），高區朗（T. C. Cochran）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分析十萬封鐵路各級主管的信件，以期瞭解他們對政府、經濟及勞工的意見，並著成鐵路領袖一書（註十五）。

在敘述歷史人物的個人人格時，傳統的傳記作家希望從傳主留下的資料中獲得深入的瞭解，但這些資料的價值每因人而異。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個人資料十分豐富，但是即使他自己也懷疑這些資料的真實程度，而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懺悔錄（Confessions）其坦白的程度雖震驚世界，但仍不免這些事實在他一生中的意義作了過份的誇張。如果史家以傳統的方法處理，便難以發見。

傳記作家的第二種資料來源是當代人士的評論。學者可從評論者對某一事物的接近程度與傳主和他的關係以判定可信的程度，長時期的瞭解勝過偶然的見識。同時史家對於偏見的存在亦特別注意，評論者是當時傳主的朋友抑敵人？他的聲譽如何？當代的人是否認爲對於人的良好裁判者。當然評論人物的

意見可以用事實或其他可靠裁判者的見解而加以鑑定。

另一分析歷史人物人格的方法是審查當事人的具體行爲，行爲較文字更爲響亮。直接的觀察其表現亦更能表現其人格的特性。通常史學方法可以決定一個人是自私的，誠實的或者漫無原則（註十六）。傳記作者的最終一種方法是採用俗文學的材料。例如林肯總統的許多故事和傳聞很難求得證明，但這些材料構成的整個輪廓却是無可置疑的，可能這些人所談的有些過份，但總是說了些關於此人的事。而有關林肯的對手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的傳聞則是大異其趣。

雜記隨筆在中外的資料中特別豐富，這些資料所以珍貴，第一是記述的內容範圍廣濶，不僅限於國之大事，社會橫剖面的情況亦多提及；第二是出於一種無意的動機，爲記述而記述，與功名利祿無關；第三對感懷的發抒與人物的臧否通常少有顧忌，每可秉筆直書，見出真象。

內容分析方法可用之於研究大部份史籍和史料，一般的史書、文獻、報刊、傳記、雜記、隨筆都是較好的材料。而用此法，可使史料產生更豐富的意義。

叁、內容分析學說與歷史研究

一、葛瑞第論內容分析與歷史研究

討論內容分析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問題必須明察其優點與缺點。目前一般的見解認爲內容分析爲測量人格和觀念的一種工具，對直覺與主觀的判斷產生科學的制衡作用。傳記作家路德維格（Emil Lud-

Wigg)說，他瞭解某一專題中的人格是不斷捉摸這人的一幅畫像，直到發現他的特質而已，但一般史家則仍然是在研究證據之前先有一概括的瞭解，並非將每一證據都加以科學的衡量，而內容分析就是在這種衡量上有所貢獻。

內容分析同時也可以幫助決定在可疑的爭論中與解說的矛盾中作怎樣的解釋。在分析個人的文件中連續性實較頻數更為重要，因可反映主題背後的關係，但連續性與頻數關係比較，前者在解釋、測量、客觀的控制方面易遭困難。是否觀念與特徵有兩項連續時必須出現在同一句子中，同一段落或同一單位，奧斯古 (Charles F. Osgood) 曾主張同在一篇演詞中出現的就算是連續的，因此單位的選擇甚屬重要，憑主觀來選定而對研究結果發生影響 (註十七)。

內容分析應用於歷史及傳記的技術亦值得重視。解釋任何計數的結果必憑研究者的心智，他的偏見及先入之見會影響到結論，而且決定何者列入計算之中也會影響結果。研究結果的價值如何實賴於建立適當的類目及對資料的精確詮釋。詮釋的步驟主要是在證明，但結論的效力則賴於研究人基本主觀的決策是否圓滿完美。

上述的困難或可用事先決定的類目 (Precut categories) 而後應用到特定問題之上，用以作人格特徵的分類，但並無任何現存的類目是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這原因如奧斯古所說，實由於尚無充分的人格理論建立之故。

另一項弱點是馬魯 (George F. Mahl) 提到的是代表抑工具性的模式問題 (註十八)。於從事歷史或傳記的內容分析時，這問題與弗洛伊德之昇華及反應形成的觀念有關，並為心理分析的傳記家所樂

於採用。內容分析可稱做是研究者用心的一種反應，但不能證明這些是代表性而非工具性的反應，雖然重要的是研究者須知道他所處理的是那種類型的反應。

在更複雜的分析中，另一個因素似乎是對某些文字部份的衡量較其餘的比重要高而產生主觀和非科學的印象。譬如懷德曾賦予極高的價值者有五項強調的單位，但不清這種比重是如何決定的，但是於進行的程序中這樣一個決定影響可能至為深遠。懷德同時促請方法的實驗者時時注意棘手的問題以及整體的意義，後者也是喬治所一再強調之點，但這問題又涉及高度的主觀因素。

最後，無可否認的以歷史學的觀點來採用內容分析還有某些弱點。出版的個人著述，特別是演詞和自傳，通常是代筆人而非署名的作者，是否一位學者在研究時可將艾森豪威爾的一篇廣播講詞或者是他的著作「歐洲十字軍」(Crusade in Europe)中所表現的人格特性視為是屬於艾森豪威爾抑他的代筆人？另外一個問題是沉默寡言。雖然當一人寫作之際，投射技術假想在理論上無人能阻止表達自己，但有程度及表達程度之別。許多公共人物在自己的信札和自傳中顯示自己的部份極微，所以保留不宣是由於個人的壓制或傳統性的保守觀念。同時心理學家尚未解決文藝的風格與人格的風格對個人的著述區別何在。就某一意識言，規格可能出現，就另一意識言，可能透過藝術的手法以滲入歪曲，致損害了內容分析的功用。又正如馬魯所言，風格與其他表達形式彼此有一些程度的文化關連，而文化是因時因地而改變的。以內容分析用於歷史研究的最大困難之一是為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時間內創立其規範(norms)。(註十九)。

總括葛瑞第的學說，可以看出內容分析為歷史及傳記學提供了一個豐富的研究園地。謹慎與深思熟

慮的運用此方，當可減少史家對主觀判斷的依賴，使之得以解決矛盾的證據所產生的疑惑，並藉縮小至可度量及重複的限度內，一般而言增強史家對他的結論之信心。

二、喬治宣傳分析原理與史學研究

喬治爲一資深的宣傳分析家，他的名著「宣傳分析」(Propaganda Analysis)是二次大戰期間爲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的外國廣播情報處(Foreign Broadcast Intelligence Service)推論納粹宣傳資料，事後將經過、方法、結果編撰成書。另外他又爲蒲爾所編的內容分析的趨勢摘要寫成「內容分析中定量和定質的研究方向」(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Content Analysis)一文，對他的主張有更明確而具體的闡釋(註二十一)。喬治認爲定質分析與定量分析雖然相異之處頗不在少，但使用時的嚴格劃分則深屬非易。他不抹煞定量分析的系統性較高，同時也強調定質分析的效力較著；前者或者已經視了全文的整體意義而作解剖式的枝節研究，後者則可全神貫注於整體意義。

喬治五項基本主張爲：

(一)定質分析具有以下特性：①定質分析用於前期的研究，在形成假設及關係；②爲一主觀程序；③有二分法的特質；④爲一彈性的方法過程。

(二)非頻數研究具有意義：高頻數與低頻數：頻數與非頻數在內容分析當中有時同樣具有意義。如史達林在真理報上的名字突然減少或根本不登，也一樣有注意的價值。

(三) 定量分析的缺點：定量分析是照字面一般的意義加以解釋，不能在表面意義之外作其他有效的分析。如墨索里尼建立起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後，德國宣傳當對此事相當注意，並且亦以墨索里尼重組擁軸心的政府深感欣慰。幾天之後，聯邦傳播委員會發現在少數幾家純粹的報紙很嚴肅的談論此事，如「戰事尚不能因墨索里尼之成就而獲勝，目前他在政府結構上的改變，亦不能當作未來成功的保證。」（註廿一）研究人員根據此一資料作非頻數的研究，即發現這段文字的重要意義，在沖淡德人對意大利法西斯勢力復活後所抱戰爭勝利的希望。這推論與日後戈培爾日記印證，證明完全正確。若以定量之法研究多半就錯過認識敵人對戰事無把握的心理。

(四) 定量分析於工作實務中亦有困難：無論由傳播的性質或推斷發訊人的蓄意，至少須用一點力量以發現新假設或改訂舊假設，以定量分析求證推論性的假設常困難重重，反而不如非定量的分析有效。

(五) 非頻數法的特性及問題：不會忽略次數較少的文字，保持有價值的推論機會；強調有效性，並敘述推論資料的疏密關係。

喬治宣傳的內容分析，主張質量之分未切實際，擬設法恢復定質分析的部份地位，而能作及時有效的分析工作。此法與史學方法最近，用以作史學的研究方法的最新增訂更新。

三、勃勒遜的定量分析與史學研究

勃勒遜於十七年前刊行其名著：傳播研究的內容分析（註廿二），全書功力深厚，創見頗多，雖不

無缺點，至今尚無出其右者。勃勒遜以定量分析為中流砥柱，將不適合此一原則之項目一概排斥出去。運用這種方法，可使步驟分明，結果可靠性甚高。但是缺點在方法本身有許多的限制，選擇研究的範圍比較狹小，所以對於史學的研究，可在部份適合量的表達時採用，極有裨益，但若以此法作整個研究過程的所本，則對某種重大歷史事故的解釋與判斷便有無能為力之憾。

綜合勃勒遜的方法約略敘述如後：

(一)很多定質的分析為「準」定量的分析：「重複地」、「極少地」、「時常」、「常常」、「強調」均是一種粗簡量的表達。

(二)定質分析的出現未出現，也可歸入量化的意識，即零和一的關係。像達芬奇在父親的訃文上兩次提到逝世的時間，反而違反常例。

(三)定質分析限於小型不完整的選樣：定質分析不經過嚴格的選樣工作，所以常是不完整和小型的選樣。

(四)定質分析通常較定量分析包涵較高的比率非內容本身的敘述部份，內容通常是通向發訊人的動機或對閱聽人效果的跳板。

(五)定質分析比較重視內容對深入現象的反映而非內容本身。

(六)定質分析較定量分析少用定型的類目(formalized categorization)，定量分析的推論是根據比較固定的公式，故必須有清晰完整的分類，方可以計數的方式進行研究，故定量分析比定質分析具有具體而系統的特性。

(七)定質分析較定量分析用更複雜的主題；分析的基本單位也較為複雜。定量分析受量化要求的限制，不得不排斥複雜的主題與單位，而取比較簡單而易作量化的研究。

以勃勒遜的見解而論，大部份是現在作內容分析研究者所遵行的。他所強調的要點是盡可能變內容成爲量化研究的型態，然後悉以定量原則去處理，裨確立方方法的系統性與可靠性。至於定質的研究，則爲氏所不取。至於主觀與客觀的問題，勃勒遜並未細作探討。實際而論，定量分析也有時需有主觀的解釋與判斷，只是在方法的設計中盡量避免而已。

肆、結論

綜合以上所述，內容分析方法不僅是研究傳播問題的新聞學者的專利品，而是人文及社會甚至自然科學各部門所樂於採用而且甚見普遍的一項研究技術。史學的研究，向來極重視方法，對於史料的內容亦特別注重審查與分析，所以近幾十年來，史家著書立說，每見將敘述性的內容加以量化，然後以統計圖表顯示趨勢，顯示異同，其數字，其分類，雖未用內容分析之名，却具內容分析之實，據此而言，真是不謀而合，令人一喜。

內容分析應用於史學的研究可延伸研究的時間。今日史家，由於史料浩瀚，因果複雜，每擇較小的題目作研究，不取綜合式的探討，而尋得前因後果與長期發展的趨向。內容分析介紹選樣方法的使用，使史家在綿延甚久而史料衆多的情形下，得作抽樣式的選擇，不必僅限於較短時期的問題研究，爲貢獻之一。

內容分析能擴大歷史研究的空間領域。人類歷史的演進，不是孤立的發展，國與國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洲與洲之間的文化都有相互往來與相互影響之事，但近代方法的發展愈趨謹嚴，選擇研究的範圍便愈縮小，實有美中不足之憾。內容分析容許學者研究許多國際問題與區域問題，以選樣的代表性為助，可免流於空泛與膚淺，誠為貢獻之著。

社會科學家與自然科學家每詬病史家的方法為缺乏系統而主觀的成份為多，所謂主觀加上判斷之譏意即在此。內容分析方法首要工作就是講求科學精神的研究，從問題的覓求，假設的形成，驗證的過程，結論與推論的確定，每一步驟均經過事先的設計，而且還要測驗方法的可靠性與有效性，這樣的一種方法，的確已符合了科學的研究精神。

內容分析不能完全做到不受主觀的影響，但是已增高了研究的客觀性。過去史家對人物的評論與史事的判斷，每有言人人殊，定於一是實在非易，因為選材，用材與擇材不常有一定不變的法則。內容分析的單位、類目確定之後，只有據實統計，而較多的數字與憑量的計算賦予個項應有的比重和意義，不能容有任何隨意為之或顛倒是非的陋習存在。

歷史研究無非是狀人述事，但文字史料的面面意義往往有欠深入。內容分析注重發掘人格與特性，從文字背後的意義以瞭解歷史或當代人物；找出象徵性的字詞句等而探求隱藏在深處的真實情形。以威爾遜的信札研究他的個性；以戈培爾的日記明瞭納粹德國的政情與宣傳策略，比讀一本平凡的戈培爾傳所獲自然增多。

（本文曾獲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謹此申謝。）

1. R. S. Baker,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Garden City, New York, 1927), PP, 110, 242—243.
2. Jacques Barzun and Henry F. Groff, *The Modern Researcher*, (New York and Burlingame,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57, 1962,) PP, 22—24.
3. Marshall S. Smith, Philip J. Stone, and Erellyn N. Glenn, "A Content Analysis of Twenty President Nomination Acceptance Speeches," 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February 1965,
4. Philip J. Stone, Dexter C. Dunphy, Marshall S. Smith, Daniel M. Ogilvie, and Associate, *The General Inquirer*, PP, 359—396
5. *Ibid*, PP 399—400.
6. Earnest O. Hauser, "News of the Far East in U. S. Dail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 PP, 658—661.
7. Richard H. Heindel,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British Pres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 PP, 320—326.
8. Martin Kriesberg, "Soviet News in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No4, vol, 10, PP, 540—564.
9. Ole R. Holsti, "External Conflict and Internal Consensus: The Sino-Soviet Case," in the *General Inquirer*, PP, 343—358.
10. Philip J. Stone, Dexter C. Dunphy, Marshall S. Smith, Deniel M, Ogilvie and Associates, *The General Inquirer*, PP, 346—347.
11. *Ibid*, PP. 350—355.
12. Richard L. Merritt, "Public Opinion in Colonial America: Content Analyzing the Colonial Pres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7, No. 3, Fall, 1963, PP. 356—371.

13. Ralph K. White, "Black Bay: A Value Analysi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 (1947) PP. 440—461.
14. G. W. Allport, "Letters from Jenn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 (1946), PP. 315—350. 449—480.
15. Thomas C. Cochran, "Railroad Leaders, 1845—1890 (Cambridge, Mass, 1953)
16. Ithiel De Sola Pool, *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 PP. 171—173.
17. *Ibid*, PP, 33—88.
18. *Ibid*, PP, 89—130.
19. *Ibid*, P. 187.
20. Alexander L. George, *Propaganda Analysis: A Study of Inferences Made from Nazi Propaganda in World war, II*, PP. 287.
21. Pool, *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 PP. 12—14.
22. Berelson,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220.